

目 录

纪念冯乃超.....编者（1）

冯乃超年谱.....李江（4）

“永远怀念他的为人”

——《冯乃超文集》代序.....丁玲（89）

怀乃超

——《冯乃超选集》代序.....楼适夷（93）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冯乃超遗作（102）

冯乃超在武汉.....锡金（107）

忆抗日战争期间的冯乃超同志.....戈宝权（130）

冯乃超同志二三事.....周而复（141）

永怀与深思.....王季思（150）

寻访冯乃超祖居.....华 嘉（154）

忆乃超.....楼 栖（159）

纪 念 冯 乃 超

编 者

冯乃超同志是我县盐步区东秀乡高村人，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横滨，自幼在日本求学。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加入日本共青团外围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一九二七年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乃超同志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他是文艺界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的主要成员，后又与鲁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起草左联“理论纲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冯乃超同志历任创造社编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冯乃超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团结知识界人士，为党的统一战线和文化宣传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华南分局文委书记。北平解放后，历任华北人民政府教

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宣党委文教分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高校党委第一书记，北京图书馆顾问。冯乃超同志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第四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冯乃超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放弃了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考试，毅然回国参加革命工作；随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热诚投身于各个历史时期革命需要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他备受迫害而坚强不屈，坚决抵制和反对“左”的错误路线。冯乃超同志终生以党的利益为重，忠贞不渝，立场坚定，正直无私，功成不居，埋头苦干，认真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同志，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冯乃超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今年是冯乃超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逝世三周年，本刊特选刊十篇文章，编成专辑，以为纪念。《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是冯乃超同志一九四八年所作的辛亥革命回忆

录，这是他谈到南海故乡的唯一一篇回忆文章。著名作家丁玲、楼适夷分别为新编的《冯乃超文集》《冯乃超选集》写的代序，著名作家戈宝权、周而复，东北师大教授蒋锡金，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楼栖，省文联华嘉同志所作各文，分别记述了冯乃超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生动具体，亲切感人，极富史料价值。李江同志编纂的《冯乃超年谱》，详细地记录了冯乃超同志一生的经历，为研究冯乃超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本刊编辑本辑时，得到省文联华嘉、梵杨同志和中山大学黄焕秋、楼栖、饶鸿竞、刘翰飞、李伟江等同志大力指导和帮助，撰写文章，提供资料和照片，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冯 乃 超 年 谱

李 江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日本明治三十四年） 一岁

十月十二日^①生于日本国横滨市。原籍广东省南海县盐步区秀水乡（今东秀乡）高村。

原名冯乃超。笔名、别名有：超，乃超，N.C.，公越，马公越，韬，子韬，冯子韬，公韬，冯公韬，仲堪，冯仲堪，李易水，洞冥，成窍，等等。

祖居日本，出身华侨资本家，乡间田地不多。祖父冯德明，号紫珊，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和爱国热忱，参加横滨兴中会，任干事，赞助过孙中山和康梁的革命活动，曾任《新民丛报》发行人，横滨大同小学校董，是个有声望的侨领。因与革命党人经常来往，家中藏有不少爱国志士避难时寄存的

①关于冯乃超出生的年月日问题，各种材料说法不一。他于日本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所填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美术史的《在学证书》，是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九月一日生，以后几种传记都写一九〇一年十月十八日（或四日）生。据他本人鉴定，前者年份有误，后者日子不确。他生肖属牛，生于农历辛丑年（一九〇一年）九月一日，即公历十月十二日。

文史书刊，又因与康梁关系密切，后来政治上倾向于保皇党。他在横滨、神户，以及香港、广州等地开办了印刷所，还在横滨与人合资经营了一家向南洋输出商品的贸易行。他对孩子们管教颇严，影响较大。一九二一年病故。祖母冯庄氏。父亲冯瑞华，号月楼，是个大少爷，不过问政治，除抽大烟外，行为不算堕落。一九二六年去世。母亲陈凤亭。兄弟姐妹六人，排行第二，姐冯顺改，妹冯顺宽，弟冯乃勤、冯乃俭、冯乃荫。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 八岁

三月 入横滨华侨开办的私立大同小学校读书一年多。常被祖父带去游温泉风景区或看电影；课余，还要背诵古书。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 日本明治四十二年） 九岁

秋 随母亲携弟妹乘“因幡丸”轮返回广东南海故乡，念私塾一年多，从《三字经》读到《诗经》。在乡村，有机会接触勤劳而贫困的劳动人民。当时处于辛亥革命前夕，村中爱国者都沉浸在慷慨悲歌的情绪中。同族三伯公之子阿赞四叔秘密研制炸弹，还请来刀枪拳术教师，在祠堂里组织练武会。有时夜里大孩子们唱着从军歌穿街过巷。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 十一岁

九月 因时局关系，祖父决定将家人带回日本。从南海经广州，至香港寓保皇党机关报《商报》馆楼上，目睹革命群众暴动的情景，后由祖父带回横滨。先念了半年私塾，再入大同小学校就读，前后共八年。成绩优秀，历任班长。每逢集会，便齐唱梁启超作词的《爱国歌》。

小学时代开始翻阅家中所藏文史书刊，浏览古典小说和诗词，如《新民丛报》、《新小说》、《三国演义》、《石头记》、《花间集》、《词志》、《迦茵小传》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和对文学的兴趣。这时开始练习写诗，但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又爱绘画，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发表过风景画。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日本大正七年） 十八岁

三月 在大同小学高小毕业，入横滨华侨与日英教会合办的志成中学校读书一年多。对民族歧视十分反感，并接受了富国强兵思想。又受国文教师朱我农（有畴）影响，阅读《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化运动。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日本大正八年） 十九岁

五月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受到新文化浪潮的冲击。插班转入东京私立成城中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部三年级，

半年毕业。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日本大正九年）

二十岁

三月 投考东京藏前高等工业学校，未被录取。

九月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相当于高中）。与朱镜我（德安）、李初梨（楚离）、彭康（坚）同学。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日本大正十年）

二十一岁

六月 郭沫若（开贞）、郁达夫（文）、成仿吾（灏）、张资平等组织的创造社，在日本东京第二改盛馆正式成立。

九月 预科毕业，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理科甲类，准备将来学习采矿、冶金或地质。与朱镜我同学。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日本大正十二年）

二十三岁

九月一日 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家庭因此破产，富国强兵思想亦大受打击，对理工科失去兴趣。此时酷爱文学，耽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书刊，以及外国文学作品，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喜欢写诗，也写剧本，有位教师评说“有高级的文学思想”。同时读到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教授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名著《善的研究》，因而向往该校。这部唯心主义的哲学著作风行日本，影响极大，被称为独创的“西田哲学”。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大正十三年）

二十四岁

三月 在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哲学科，听西田博士的课，与彭康同学。广泛阅读文学、哲学书籍，写诗较多，有唯美主义倾向。与李初梨及其弟李亚依（旦丘）等编辑《涟漪》诗集手抄本一册。还结交了郑伯奇（隆谨）、李铁声（声华）等人。爱读高蹈派、象征派的作品，如日译法国魏尔伦（1844—1896）的诗集，比利时梅特林克（1862—1949）的剧本《青鸟》，日本三木露风（1889—1964）和北原白秋（1885—1942）的诗集等。当时住在京都古城法善寺山下，附近有座清水寺，在晨钟暮鼓的陶冶下萌生了出世思想，对三木在北海道脱辣比斯特修道院所过“沉默、祈祷、劳动”的生活，亦心向往之。然而这种心境没有持续多久，夏季赴东京与堂叔冯子章往千叶县度假，开始厌恶虚无的“西田哲学”，力图摆脱苦闷孤寂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日本大正十四年）

二十五岁

三月 在朱镜我的建议下，离开了死水般的京都，转学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但对所学课程仍不感兴趣。寓东京市外代々木富ヶ谷町一三九六番地渡边方。

下半年，移居神田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七号室，与穆木天（敬熙）交往，并谈诗。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日本昭和元年）

二十六岁

一月 改学美学与美术史专业，选修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考古学。喜爱艺术，经常跑博物馆，看话剧，听音乐，参观美术展览等。

由于国内北伐战争的影响和日本马列主义运动的发展，冯乃超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参加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和读书会。从日文、德文中读了一点马列的书，也读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书，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受盛极一时的日本福本主义（福本和夫的理论体系）“左”倾思潮影响较深，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认识。开始注意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访问过他们机关刊物的编辑部，观看过他们剧团的彩排，阅读过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

在此前后，写出一批象征主义诗篇，后集成诗集《红纱灯》，部分作品在上海创造社刊物上登载。从此与创造社发生关系。继穆木天之后成为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本年发表诗作如下：

三月十六日 发表组诗《幻想的窗》七首，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六月一日 发表组诗《死的摇篮曲》七首，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七月一日 发表诗歌《生命的哀歌》一首，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同日 发表诗歌《夜》一首，载《洪水》半月刊第二卷

第二十期。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日本昭和二年） 二十七岁

二月一日 发表组诗《红纱灯》八首，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本月 在郑伯奇重赴日本京都期间，与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讨论，希望创造社转换方向，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郑于四月回国，将此意转告创造社同人。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激起了留日进步学生的满腔义愤。事后，冯乃超曾几次赴京都参加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政治集会，如欢迎从国内到日本避难的杨贤江，听李初梨用日语讲演“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将因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染得更加鲜红”，等等，经彭康介绍，参加了潮音社。

六月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早已于上年十一月改组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普艺”），现又分裂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艺术派）和劳农艺术家联盟（文战派）。冯乃超在东京时与两派都有联系。次年四月，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成立。

九月 成仿吾从广州返上海后赴日本东京。邀请冯乃超回国参加创造社工作。成又赴京都邀请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同行。他们都同意弃学回国，表示对国内反动派的抗议。并商议创办一个文化思想杂志，宣传马列主义理论，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掀起一个新的启蒙运动。

十月三日 鲁迅（周树人）从广州抵达上海，开始了最

后十年的光辉历程。

本月 与朱镜我 从日本回上海，初寓北四川路底余庆坊。下月，李初梨、彭康、李铁声亦回上海，一同参加后期创造社工作。后四人迁寓乐安路纪家花园（李初梨另住）。

十一月上旬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经潮汕、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寓乐安路。

十一月八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一次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至次年四月，这条路线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十一月九日 郑伯奇等人早有联合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起新兴文学运动的计划，征得郭沫若同意，决定邀请鲁迅合作。当天郭伯奇、蒋光慈（光赤）、段可情同访鲁迅，商谈合办杂志事宜。鲁迅欣然允诺，认为不必另办杂志，恢复《创造周报》即可。

十一月十九日 为商定恢复出版《创造周报》的具体问题，郑伯奇、段可情再访鲁迅。

十二月三日 《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优待定户》广告，预告该刊准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出版；并列编辑委员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陶晶孙、赵伯颜等三十余人。

本月上旬 郭、郑联合鲁迅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

事先未与成仿吾商量过，事后又未征得刚回国几位同人的同意。经郭沫若电催，成仿吾从日本回到上海。接着成与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李铁声商谈，他们一致主张停止恢复《创造周报》，创办新型杂志《抗流》（后改《文化批判》）。郭、郑等人作了退让，与鲁迅联合一事无形作罢。成仿吾他们按原定计划进行，从此开始了创造社后期的活动。

尔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在郭沫若寓所会见了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人，主要了解当前日共提出什么口号的问题^①。潘汉年负责与他们五人联系。陈独秀派郑超麟到创造社指导社会科学读书会，后又派彭述之企图拉拢他们。陈下台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改派潘问友（东周）、吴黎平（亮平）去指导工作，并几次亲自会见创造社同人。^②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八岁

一月一日 《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初版本出版。封三刊登《〈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广告，宣布该刊决定在一九二八年第一个星期日（元旦）刊行；并列编辑委员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段可情，特约撰述员鲁迅、蒋光慈、张资平、陶晶孙、穆木天、赵伯颜、潘怀素、麦克昂、李初梨、冯乃超、彭坚、李白华、李声华、袁家骅、许幸之、倪貽

①据李初梨回忆材料。

②据冯乃超自传材料。

德、敬隐渔、林如稷、夏敬农、黄药眠、杨正宗、孟超、张牟殊、杨邨人、黄鹏基、张曼华、高世华、聂绀弩、邱韵铎、成绍宗等。封底另载《〈创造周报〉优待定户启事》。但此事并未实现，紧接着又出版了《创造月刊》同期的另一版本，正文次末页以创造社名义增刊《〈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说明“本社受《文化批判》同人诸君的委托，谨预告《文化批判》月刊将于明十七年元月中与诸君相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一般以及其余有关的各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封三则换成《〈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又说“本报原定一月一日复活起来，重做一番新的工作，但目前因为本报同人拟一心致志于《创造月刊》的编辑关系，故议决先将周报停办，同时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一种。”启事之后预告了《文化批判》创刊号要目。封底虽然照旧，但在启事末尾另加“附注”：“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这样《创造周报》的复刊终于流产了。

发表组诗《凋残的蔷薇》九首，载同期《创造月刊》。

同日 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邨人创办《太阳月刊》，并组织太阳社。此后创造社和太阳社，热情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积极介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两社尽管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但在批评鲁迅上却是一致的。

一月十五日 《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共出五期（第五期改名《文化》，未署具体出版日期），协助朱镜我编辑前三期。成仿吾作《祝词》，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运

动，它的历史任务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为革命“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本期发表论文《艺术与社会生活》，引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证“人类的思想是受着生活过程底规定和制约的，不论任何思想也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底制限，历史上怎样伟大的思想也不能脱离该当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制约。”文章提倡革命文学、新兴艺术，但未能运用正确的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的文艺现象，又受国际“左”倾思潮的影响，因而对叶圣陶、鲁迅和郁达夫等人作了错误的或片面的评论，认为“鲁迅这位老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这便是革命文学论争的发轫。接着，创造社，太阳社的李初梨、成仿吾、彭康、钱杏邨等撰文呼应，鲁迅也写了《“醉眼”中的胧朦》、《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予以反驳，于是在进步文艺界中展开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

该刊同期发表独幕戏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诗两首《上海》、《与街上人》，揭露“上海——简直一个战场！”“虎狼般的列强，生擒着奴隶制度下的柔羊。”标志着冯乃超诗风从颓废到革命的转变。

二月五日 郭沫若应邀往冯乃超等人寓所，谈说“八一”南昌起义问题。

二月十五日 发表诗歌《流血的纪念日》，小说《Demonstration》（示威），翻译辛克莱的论文《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均载《文化批判》月刊第二

号。

二月二十四日 郭沫若为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在我党的安排下，用南昌大学教授吴诚的假名，秘密离沪去日本，开始十年艰苦的政治流亡生活。

三月十日 新月派的喉舌《新月》月刊创刊，徐志摩写了《〈新月〉的态度》一文，打着“健康”与“尊严”的旗号，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攻。

三月十五日 郭沫若化名麦克昂发表论文《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号召文艺青年“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克服资产阶级意识。他不同意有些人对“语丝派”的错误看法，认为徐志摩等人才是“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载《文化批判》第三号。不久又发表《桌子的跳舞》，对革命文学论争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后来却化名杜荃，在冯乃超主编的《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又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

发表六场戏剧《支那人自杀了》（原刊误印为七场），翻译《国际政治的最近形势》，署名马公越，均连载《文化批判》月刊第三号至第五号。

四月上旬 创造社与太阳社因在谁喊出革命文学的“第一声”等问题上发生论争，为结成统一战线而举行联席会议。创造社参加者有成仿吾、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郑伯奇、华汉（阳翰笙）、李一氓（民治）、王

独清、张资平、龚冰庐，太阳社方面有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会议由成仿吾主持，他说应该联合起来，并解释《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一文措辞激烈的原因；李初梨、彭康阐发了他们对日本文坛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朱镜我批评《太阳月刊》的态度；王独清对太阳社则是半调解半责备。接着，蒋光慈发表了对于文艺运动的意见；钱杏邨表明了写作《关于〈现代中国文学〉通信》的态度，又引起创造社的反击。最后决定：每星期开联席会议一次，相互批评，以求进步。尔后钱杏邨又作《批评的建设》，批评创造社只会抄书不知行动。

四月十五日 发表论文《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还有李初梨的《请看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等文，对鲁迅进行全面的反批评。均载《文化批判》月刊第四号。

四月二十日 第一本诗集《红纱灯》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二十种，分八辑，共收诗歌四十三首，属象征主义之作。一九二七年九月七日写于日本的《序》中说：“此集中，尽是一九二六年间的作品。”又说“你们会看见小鸟停在树梢振落它的毛羽，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它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

五月一日 发表历史小说《为什么褒姒哈哈大笑——一篇木头戏脚本的草案》（后易题《傀儡美人》），借周幽王残暴和耽于女色的历史故事，影射、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同日发表诗歌《纪念